

臺灣北部沿海地帶的原漢互動記憶之口述調查

梁廷毓*

摘要

清治時期，位於臺灣北海岸馬賽族 (Basai) 的金包里社、大雞籠社與三貂社，與歷史上生活於東海岸的阿美族、噶瑪蘭族關係密切。除了有相近的祖源地傳說、跨島遷徙傳說之外，也以東臺灣海域作為部落之間貿易、交流的航行船道。目前研究大多以清代漢人土地開墾制度下出現的地契、文書，進行部落社會變遷及地權變化的研究，鮮少關注到三貂社、金包里社與大雞籠社位於台灣東北海岸的淺海水域之傳統漁場領域，在原漢族群互動方面的水域關係和記憶。根據筆者的訪問，今日在東北海岸地區仍有一些漢人及平埔族原住民後裔的耆老，仍能傳述地方上昔日的族群互動記憶，甚至存在過往族群雙方在沿岸和淺海地帶的水域界線有所記述，甚至留存不少海洋傳說。本文以此為基礎，進一步探討、詮釋南島環境、族群歷史文化與海洋記憶之間的關係。並企圖指出，若能考慮納入「淺海地帶」這一處地理空間，理解為原漢人群接觸過程中一道更為動態的人群界線，那麼便能將沿海部落的海洋記憶、口述歷史裡的淺海水域，視為一處傳統生存的範圍，作為重新思考當代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及歷史轉型正義等課題，在北臺灣淺海水域可能推展的討論面向。

關鍵詞：馬賽人、南島語族、原漢關係、海洋記憶

*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術學系藝術批判與實踐研究博士班研究生。tyshells@yahoo.com.tw

一、前言

目前研究已知過去生活於台灣北海岸及臺北盆地一帶的凱達格蘭族 (Ketagalan)，係為日本人類學者伊能嘉矩 (Ino Kanori) 於 1896 年來臺調查研究時命名 (李壬癸 2001:155)。至少可以分為「馬賽」(Basai)、「雷朗」(Luilang) 和「哆囉美遠」(Torobiawan) 等不同的社群 (李壬癸 1997:40-41)。¹就分布位置而言，可分為分布在淡水河和新店溪以北或以東的馬賽族人，以及淡水河與新店溪以南或以西的雷朗人；哆囉美遠人則為後期遷移至宜蘭平原之社群。其中，分佈在台灣北部沿海地帶的馬賽族人，在清代文獻紀錄裡，主要有大雞籠社、金包里社與三貂社等部落，位於今日北海岸的金山、萬里、基隆至東北角的貢寮等處。本文藉由田野調查及口述歷史訪問，即聚焦於此北海岸三社部落之後裔耆老的原漢族群互動記憶，初步討論族群記憶的形塑及其當代面貌，反映族人對於海洋歷史的建構及認知面向。

二、相關研究回顧

屬於臺灣北海岸馬賽族的金包里社、大雞籠社與三貂社，與歷史上生活於東海岸的阿美族 (Amis)、噶瑪蘭族 (Kavalan) 關係密切。除了有類似的祖源地、跨島遷徙傳說 (詹素娟 1998)，其使用的「馬賽語」為 17 世紀初葉臺灣東北部地區盛行的南島語言，也是區域性的通用語言 (李壬癸 2001)。學者康培德曾以環境生態、商業貿易、地理分布、社會制度等角度，從馬賽族以臺灣東北部海域作為部落之間貿易、交流的航行水域的現象，指出馬賽族在近世初期 (early modern period) 的南島語 (Austronesian) 文化世界的東南亞脈絡裡的特殊性 (康培德 2003)。從過去馬賽族人的部落、村社所在的北臺灣沿海之地理位置而言，馬賽族可能是南島語族 (Austronesian-speaking peoples) 當中最北的一支人群，活動範圍涵蓋今日的東海與西太平洋一帶。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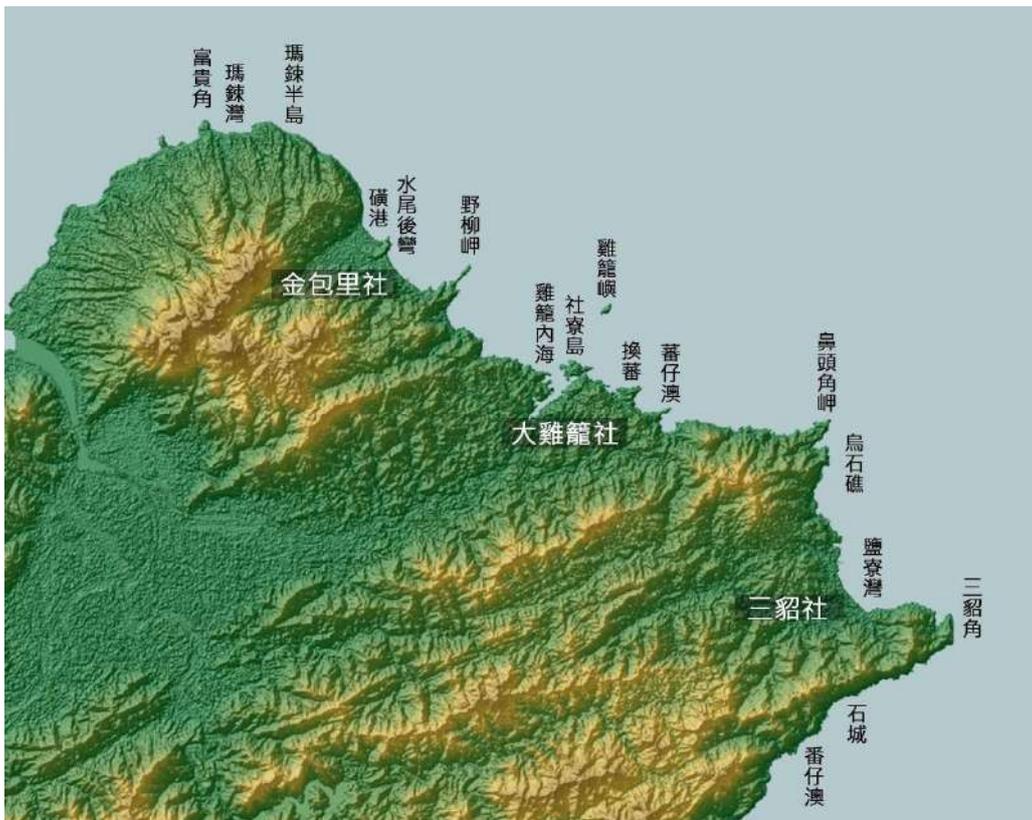
¹ 劉益昌的研究，曾依據馬賽人的祖源傳說，加入被視為哆囉美遠人的里腦、歪仔歪等二社，並從考古資料推測蘭陽平原至立霧溪亦為過去馬賽人的活動範圍。參見 (劉益昌 1998:11-13)。

² 此一觀點可參閱《臺灣文化誌》的記載：「與那國島之海中，有一稱『高砂』之『長耳人國』。昔日此高砂人，常渡與那國掠人為害」，參見 (伊能嘉矩 2011:481)。另一方面，也有北臺灣原住民操舟至中國沿海交易的紀錄，參見 (翁佳音 2008:50)。因此推測過去北臺灣沿海地帶的原住民，活動範圍可能涵蓋今日台灣東北角外海至與那國島一帶海域。

回顧目前的研究，大多以歷史檔案作為主要材料，學者翁佳音的〈近代初期北部台灣的商業交易與原住民〉首先指出近代初期北臺原住民具有的商業性格，認為馬賽原住民懂得計算、富有語言能力、善於操舟航行於近海，進而漸有貨幣交易的商業行為，因交易而形成交易圈與交通圈（翁佳音 1999）。康培德的〈十七世紀上半的馬賽人〉探討十七世紀上半葉散居臺灣北部、東北部海岸或河口處的馬賽人，在區域貿易裡扮演的角色，進而討論馬賽人的集體特色，經濟動動與村社關係（康培德 2003）。陳宗仁的〈十七世紀末〈馬尼拉手稿〉有關雞籠人與淡水人的描繪及其時代脈絡〉討論西班牙人想像中的雞籠人、淡水人形象及其隱喻，透過〈馬尼拉手稿〉中雞籠、淡水資料的性質與內容，探討這些資料與當時歷史脈絡的關係（陳宗仁 2013）。另一篇則指出大雞籠社人，早在十七世紀上半葉，因具有商業性格，擅長貿易活動，並以社寮島為據點，與他者密切互動（陳宗仁 2012）。吳佳芸的〈從 Basay 到金雞貂——臺灣原住民社群關係之性質與變遷〉檢視十七世紀至清代的北濱原住民一指涉的對象分別為十七世紀的 Basay 部落，與清代的金包里、大雞籠、三貂等三個部落，於經歷過西荷勢力進駐與納入清朝的帝國體制下，其社群內部結構、對外的村際關係、與外來勢力的互動方面之現象及變遷（吳佳芸 2010）。

另一方面，則以清代「番界」劃設與漢人土地開墾制度下出現的地契、文書，進行部落社會變遷及地權變化的研究，企圖重建十六至十九世紀的北臺灣馬賽族人的地域社會及部落歷史。詹素娟的研究〈地域社群的概念與檢驗——以金包里社為例〉曾指出大雞籠社與金包里社之間的緊密社群關係（詹素娟 2001）。宋錦秀的〈嘉慶以前三貂鹽寮地域史的建構〉一文與溫振華的〈臺北縣鄉土史的重建：以三貂社為例〉，皆聚焦探討清代三貂社及其面對漢人開發的歷史過程（宋錦秀 1996；溫振華 1995）。近年簡宏逸的〈從麟甲到社船：1650 年代至 1750 年代臺灣北迴沿海航路的商業活動〉指出早期馬賽人麟甲控制臺灣東北海岸貿易的實況。馬賽人在此的貿易壟斷延續到十八世紀初，但漢人也持續滲透此處的貿易（簡宏逸 2020）。學者鄭瑩憶的〈北臺灣大雞籠社的生計模式與地方社會變遷（1620-1900）〉則指出十八至十九世紀，社人們為了維持漁業與商貿事務，藉由與漢人漁民合建寺廟，取得與漢人社群協商資源整合與調解衝突的空間；另一方面又保留番社原生祭儀、利用祖源敘事，形塑清代社寮島番漢「融合又分立」的地域社會（鄭瑩憶 2021，67-68）。

然而，上述研究較少探觸到當代族裔的記憶形塑與建構。多數文獻皆較少關注到三貂社、金包里社與大雞籠社位於臺灣北海岸的淺海水域之傳統漁場領域，在原漢族群互動方面的關係和記憶。筆者認為平埔族裔作為族群復振運動的核心行動者，其歷史記憶反應何種當代社會的需求及影響，也需要進一步探究。根據筆者的訪查，今日在東北海岸地區仍有一些漢人及平埔族原住民後裔的耆老，仍能傳述地方上昔日的族群互動記憶，甚至存在過往族群雙方在沿岸和淺海地帶的水域界線有所記述，亦留存不少海洋傳說。本文將以此為基礎，進一步探討及反思南島環境、族群互動與海洋記憶之間的關係。



圖版 1 本文口述調查內容提及之相關地名與位置概略圖（圖片來源：作者製圖，2021/4/6）。

三、原漢互動下的海域記憶

在地方耆老的記憶中，淺海水域、沿海地帶曾經作為原漢人群活動的接觸地

帶，曾經有過各式的交易、合作與競爭關係。因文章篇幅的關係，在此茲錄幾則地方採集到的第一手口述材料，進行相關的探討。必須強調，筆者不排斥受訪者之報導，有受到近年原住民族文化及歷史復振運動影響之可能，對於口述內容的真確性也有所保留；也不排除因所探訪之內容，較少由過去人類學或歷史學研究的田野調查工作所關注，但仍以家族或地方記憶的形式，流傳於地方社會之可能性。首先，是一則描述傳統漁場和周遭島嶼資源關係的口述：

以前包括基隆嶼，一直到棉花嶼、釣魚臺，都是我們的活動海域，漁產豐富，老一輩說棉花嶼盛產火山浮石、釣魚臺是我們向北航行的中繼點，因為我們和琉球人很好，在漢人還沒進來之前就有很頻繁的交易和互動，像是兄弟之邦一樣（作者 2020/06/12 訪談稿）。³

釣魚臺是我們族人傳統生活領域，祖先常在島上搭建簡單工寮，遮風蔽日擋雨，捕魚累了就登岸休息。在 1895 年之前，我們的生活還跟釣魚臺密不可分，後來被漢人和日本人的漁船搶去……我們原來稱那座島為「釣依達阿」，意思是航行時往返的跳板（作者 2022/02/17 訪談稿）。⁴

根據上述兩則耆老的口述，皆特別強調是「漢人還未到來之前」的情形，並描述北海岸馬賽人的傳統海域與漁場，除了北臺灣沿海近岸的灣澳和海岬之外，也包含基隆嶼、彭佳嶼、棉花嶼、花瓶嶼、與那國島至釣魚臺列嶼等地附近的淺海水域。⁵值得注意的是，1873 年的《臺灣清國屬地》地圖裡，三貂鼻的西邊標註為「琉球灣」（圖 2）。而在 1880 年的《全臺前後山圖》裡，於大雞籠社所屬的社寮島和三貂社域內的雙溪澳之間，標註一處「琉球澳」（圖 3），和前者地名應是同一處位置。另根據《臺北縣誌》記載，今日新北市貢寮區澳底一帶海灣，於 19 世紀中葉曾有日本琉球人至當地捕魚，因該港天然環境優越，且魚產豐富，便遷居當地，該港灣故名「琉球澳」（唐羽 2004：296）。

³採訪時間：2020 年 6 月 12 日，採訪地點：基隆市林姓耆老自宅。因受訪者要求匿名，故以林姓耆老代替。然而在《閩中異事》記載雞籠一帶「每秋天無雲，海波澄靜，登高極望，有三數點如覆，問耆老云，是海北諸夷國，不傳其名」（李復 1983：19-20）。據學者黃麗生推測，應為台灣北部基隆外海的棉花嶼、花瓶嶼、彭佳嶼等（黃麗生 2019：7）。若當時族人稱北方三島「海北諸夷國，不傳其名」，那當代耆老的口述仍需要多加考證和比對。

⁴採訪時間：2022 年 2 月 17 日，採訪地點：新北市貢寮區林勝義耆老自宅。

⁵目前僅有調查出釣魚台列嶼的族語，尚未訪查到基隆嶼、彭佳嶼、棉花嶼、花瓶嶼的族語名稱，以及部落漁場或水域的族語。此項研究材料之限制，有待未來持續探究。



圖版 2:《臺灣清國屬地》中的「琉球灣」。
(圖片來源：日本國立公文書館
藏。作者翻攝，2021.04.06)。



圖版 3:《全臺前後山圖》中的「琉球澳」。
(圖片來源：美國國會圖書館藏。
作者翻攝，2021.04.06)。

另一方面，位於臺灣東北外海的釣魚臺列嶼，在耆老口述裡聲稱該島為「航行時的往返跳板」，但是「後來被漢人和日本人的漁船搶去」。相關新聞也曾報導馬賽族人後裔曾宣稱「祖先曾經登釣魚臺，釣魚臺本來是周圍南島語族的漁場」（原住民族電視臺 2012）。但這項說法究竟是家族記憶的傳述，或是當代復振運動中的文史建構的結果，仍需進一步查證。接著是耆老講述過去馬賽族人和琉球群島方面與那國島（ドゥナン）的人群互動記憶：

與那國島是我們稱作「伊娜」的地方，意思是母親的意思。傳說是我們祖先來的方向。在漢人進來之前，我們和與那國島的人很多都是親戚，一直有通婚和貿易，語言也是互通的，兩邊因為要做生意，對方的話都很會說（作者 2021/08/05 訪談稿）。⁶

必須注意，這樣的口述歷史內容有幾點需再釐清：一為與那國島傳說祖先來的方向，然而琉球族並非南島語族，且臺灣原住民的來源目前以西來說與南來說為主，北來說並非主流。仍有需要再做更細緻的說明或考證。受訪者指稱兩地語言互通一事，八重山群島地區的琉球語系——與那國語（Yonaguni language）與南島語系馬賽族的馬賽語（Masai）是否與相通，亦需要有更多證據或研究成果來支撐或證明。但是，可以參照學者黃智慧關於兩地「傳說圈」的研究成果。該研

⁶採訪時間：2020 年 8 月 5 日，採訪地點：新北市貢寮區林勝義耆老自宅。

究透過傳說類型的比較與分析，指出包含馬賽人在內的「Sanasai 傳說圈」，實際上和與那國島的「太陽所」傳說的子題不謀而合，二者在結構上類同頗多。因此推論與那國島人的祖先亦同屬於源自南方故鄉的族群之一。認為將與那國島的「太陽所」起源傳說視為「Sanasai 傳說圈」之一的話似不為過（黃智慧 2000：221）。顯見兩地因地緣位置，過去可能有人群接觸或遷移路徑重疊的情況。

另根據田野訪談資料，過去的金包里社和大雞籠社以「野柳岬」為界；大雞籠社和三貂社以「鼻頭角岬」為界；三貂社和蘭陽平原的噶瑪蘭人以宜蘭頭城濱海的「番仔澳」一帶為界（作者 2022/04/25 訪談整理）。⁷認為在臨海地區皆是以明顯向外海延伸的海岬地形作為社域的分界，也以此劃分出淺海地區的部落漁場範圍。⁸但在漢人移入、族群雙方接觸之後，則在近海沿岸一帶形成新的海域界線，內容上也呈現出另一種描述方式：

我們這裡以前是用一顆「烏石礁」，做為和漢人他們漁場的分界，過了那顆礁石就是我們的範圍，「烏石礁」以東就是我們三貂社的範圍。漢人就不敢過來，越過來偷捕魚就會被我們殺掉（作者 2020/06/18 訪談稿）。⁹

凱達格蘭的港都是天然的，鹽寮有一個黑石礁，漢人不得闖入，那是三貂社與漢人的天然界線，我們要到浦雅行船比較快，不會走山路，那漢人的船，看到我們的船隊，都閃得遠遠的，因為我們航海技術很好，他們在海上跑不過我們（作者 2021/07/02 訪談稿）。¹⁰

根據耆老的口述，三貂社族人曾以一顆「烏石礁」（今日的澳底外礁）作為漁場的界線，礁石以東屬於三貂社的水域，若漢人「越過來偷捕魚」便可能被殺害。值得注意的是，是否漢人船隻的越界行為，也被視同入侵部落的社域？若是如此，那馬賽族人過去對於傳統社域空間的概念，是否有可能涵蓋特定的海域，而不僅限定於陸地？因為資訊有限而無法確定，仍需多加探考。另一方面，與前

⁷採訪時間：2022 年 4 月 25 日，採訪地點：潘江衛耆老、林勝義耆老於基隆市原住民文化會館。

⁸然而沿海岬角是否必定是過去社域分界線？筆者認為需要有更多的證據支持，此處僅為當代耆老之記憶。

⁹採訪時間：2020 年 6 月 18 日，採訪地點：新北市貢寮區潘姓耆老自宅。因受訪者要求匿名，故以潘姓耆老代替。

¹⁰採訪時間：2021 年 7 月 2 日，採訪地點：基隆市潘姓耆老自宅。因受訪者要求匿名，故以潘姓耆老代替。

述耆老口述有領域空間相關性的則是對沿海港灣、河口的控制權之口述：

鹽寮海灣這裡以前漢人有「三港，五水，八卦流」的說法。以前靠海的石城和舊社、新社，都是我們的老部落，馬崗和卯澳是漢人的聚落。我們是地主，雙溪河口是我們在管理的，甚麼貨物進來，要運到石碇港，鹽寮港，新社港，都要經過我們原住民才能往上游送（作者 2021/09/14 訪談稿）。¹¹

我們祖先以前住在「和平島」的南側，剛好是基隆港的大門口，就在這裡跟漢人的小船收過路費。因為我們以前的船比他們的大艘，可以座很多人，可以遠程航行。他們的小船只能在岸邊、港邊風浪小的地方捕魚，所以會進到基隆港裡面，經過的時候就繳過路費給我們，所以說以前基隆港算是我們部落的內海（作者 2022/03/09 訪談稿）。¹²

根據耆老的口述，三貂社以前曾控制鹽寮灣（三貂灣）與雙溪河口一帶的物資流通事務。並且提到石城和舊社等地皆曾經是部落所在地。馬崗和卯澳則是漢人入墾之後形成的聚落。另一方面，則是對於基隆港灣行船權利的掌控，並將基隆港一帶視為過去部落的「內海」。其中，大雞籠社族人可能是搭乘承載 25、26 人的「海蟒甲」出海，或是「蟒甲」（Makay）、「粒掙」（Laya）等船隻（陳世一 2005：36）。儘管無法證實口述的真確性，但是這類海洋記憶型塑的結果，似乎反應昔日沿海部落人群對於異族在鄰近水域活動的重視。此外，根據筆者的訪問，今日宜蘭東北部的「石城」一帶，仍留有「海上來的番仔」一說：

這裡以前有一個「城」，沒有很大，但石牆很厚、很高。聽老人家講，是以前有海上來的番仔，會出草、搶劫，所以我們要防禦他們，就蓋一座石城在這裡，現在都被拆掉了（作者 2021/09/26 訪談稿）。¹³

據耆老所述，「石城」一帶為三貂社的傳統範圍；但是在當地漢人的記憶裡，相傳這一座臨海而築「城」，是為了防範「海上來的番仔」前來出草、搶劫。或許昔日從海上來的威脅者，還包括在大陸東南沿海的海盜，但是當地漢人仍以「出

¹¹採訪時間：2021 年 9 月 14 日，採訪地點：新北市貢寮區潘姓耆老自宅。因受訪者要求匿名，故以潘姓耆老代替。

¹²採訪時間：2022 年 3 月 9 日，採訪地點：基隆市潘江衛耆老自宅。

¹³採訪時間：2021 年 9 月 26 日，採訪地點：宜蘭縣頭城鎮石城張姓耆老自宅。因受訪者要求匿名，故以張姓耆老代替。

草」這個過去原住民習俗相關的詞彙來描述。但是就地緣關係而言，「石城」位於宜蘭噶瑪蘭和三貂社的交界地區，仍無法確知究竟「海上來的番仔」所指為那群人。但這則記憶仍反映出漢人和原住民接觸過程中的居地競爭關係，以及原住民過去具有的海洋流動特性。另一方面，在今日基隆八斗子附近，也留有一處名為「換番」的地名，傳下昔日原漢交易的地方記憶：

「望海巷」在以前稱為「換番仔」，是八斗子地區漢人與瑞濱、蕃仔澳一帶平埔族以物易物的地方、交換物資的地方。那時，七斗仔還有平埔仔原住民在那裡。望海巷、換番那邊的平埔仔原住民，以前抓魚時連他們的厝還看得到，還用魚和他們換過米跟菜，那些人何時失蹤不知道，沒聽人家講（陳世一 1998：36）。

據文獻記載，「換番」原為八斗仔居民和原住民交換物品的所在（廖秋娥 1996：84）。清乾隆初年來自福建泉州同安的杜昭文與長男杜茲棟、次男杜茲麟、三男杜茲神、四男杜茲用、五男杜茲推等五位兒子，先到基隆，再輾轉找尋落腳的地點，而到達八斗子島的東南東方屬長潭尾偏北之地，在那裡建了幾間草厝，同時利用這裡沿海豐富的漁類資源維生，再用捕到的漁獲和對岸換番的平埔族交換食物（杜披雲 2000：54）。在耆老口述中，「換番」一帶是蕃仔澳一帶族人和八斗子地區漢人的交易地點，也是雙方勢力的交界地帶。顯見在漢人登陸北海岸地帶進行初墾時，沿海地區儘管腹地狹小，但仍有番社和漢莊的界線，雙方會選定一處進行物資交易。接下來，筆者會從原漢族群雙方在淺海地帶的接觸歷史與當代口述為基礎，進一步反思北臺灣沿海部落與淺海水域記憶的形塑樣態。

四、族群記憶的形塑及反思

儘管許多研究已經指出，口述歷史的內容會因為各種政治、社會因素而不斷流變，而有其歷史考證的困難，甚至大多數的當代族裔，因為進入到現代教育的書寫體系，或是藉由族群復振運動的重新建構，而使得當今我們去區辨口述者的口說方式和內容來源，是否已受到晚近出土的史料、相關學術研究和原住民族知識體系建構意識的影響，而變得越趨困難。但是，如果能謹慎地從記憶研究與口述歷史的視角，或許能夠從一些馬賽族人後裔耆老的家族記憶的角度，來重新審視族群互動記憶的型塑樣態，並賦予口述內容和歷史記憶一個具有主體性的敘事位置，藉以反思長期以陸域開發及漢人為核心的開發史敘事。

筆者認為，目前以金包里、大雞籠、三貂社為主體的歷史書寫之困難在於，當筆者考察既有的地方史紀事，仍多以漢人為中心的陸域開墾進程作為時間斷點，呈現的是漢人移墾社會的形成歷程，而非以沿海部落社會為主體，或是原漢族群互為主體思考下的時間進程。在歷史文獻方面，此北海岸三社族人在文獻中的身影，早期多以文明程度較低的他者形象存在，而在與漢人有所互動之後，又轉換為逐漸融入漢人社會的土地開墾者形象，忽略其生活型態及領域界線與海洋的緊密關係。更重要的是，鮮少關注部落口傳歷史裡的淺海水域，作為傳統生存範圍，及其作為「傳統領域」的可能思考面向。

本文所採錄和收集的耆老訪談中，無論是海岸線附近的「換番」指出的原漢交易區帶，或是「石城」帶有的族群防衛空間之意涵；抑或是「烏石礁」所標記的原漢淺海水域之活動界線；鹽寮海灣和雙溪河口水域的控制權。這類記憶可能反映出人們在地理空間的認知上，視淺海水域及海岸線作為昔時原漢人群勢力接觸的前緣地帶。進一步論，部落因為沿海平原的腹地大小、港灣地形、硫磺資源與水域資源的差異，在面臨敵對部落或沿海漢人漁村社會形成的壓力時，可能有不同的應對方式。例如，對臨海而居的部落而言，當有敵對部落人群的船隻或是外來漢人因為尋找登陸點而近岸航行時，是否意味著侵入部落的社域？從前述的調查中，耆老傳述對漢人物資流通河口、港灣的控制權，以及越過界線偷捕魚就會被殺掉之族群記憶。可以推測過去沿海部落的社域空間概念，可能包含維繫部落生存的淺海地帶和船隻停泊的港灣，而不僅是居住房舍所在的陸地。

值得注意的是，同時也無法排除的社會環境因素，是這些家族記述方式與觀點，可能伴隨著 1980 年代本土意識的抬頭、新聞媒體大量有關平埔族群的文史報導，以及主流學術圈對於平埔族研究的重視。再加上近幾年社會上對「平埔族群正名運動」的關注所推波助瀾下，產出的一系列家族史書寫。¹⁴在此社會運動所發展出來的「原住民」分類意識，是以漢人為對比類屬（王甫昌 2003：118）。換言之，晚近臺灣在政治、社會環境因素與認同意識的轉變，應是這類人群記憶得以出現的重要條件。然特殊之處在於，這類記憶多數提及淺海地帶（而非限於陸地）為原漢族群互動和競爭的場域，除了反映以水域為生存空間的歷史認知，也呈現一種特殊的海洋記憶面貌。

¹⁴參看學者黃美英（1996）整理出版的《凱達格蘭族文獻彙編》。

進一步論，部分耆老在描述過去族人的傳統漁場和附近島嶼的資源及作用時，連結了北臺灣沿海的部落與東北外海的棉花嶼、釣魚臺列嶼和與那國島的交往關係，這類當代記憶隱約呈現一種群島式的地理思維。既往研究已經指出，一直至 19 世紀，雖然受到漢人社會的衝擊和影響，但馬賽族人可能仍保有一定的海洋性格。¹⁵這類地方記憶也提醒我們，或許應該避免過於浪漫化對於海洋人群歷史的想像，因為淺海地帶在當代地方族裔耆老的認知中，並非晚近臺灣社會認知下主流海洋史論述當中，那一種全然開放、流動的海洋地理空間。因此，在以海洋為中心的島群思維和南島人群文化歷史當中，北臺灣淺海地帶無疑是一處需要進行再思考的人文地理空間。

具體而言，從當代族人的記憶傳述裡，過去三貂社、金包里社與大雞籠社的社域，除了包含沿海一帶的淺山和平原，也擴及北臺灣的淺海水域及島嶼。在每個時期皆存在不同變化的歷史想像與認知。未來若能佐以相關實證史料的研究，從原漢人群互動關係的角度切入探究，或許可以看到漢庄與番社之間的界線異動和水域、地域界線的變動狀態，擴展施添福「力的番界」概念於臺灣北海岸地帶原漢族群關係的研究。已有學者指出北臺灣地區的漢番界線與族群人文地理帶的關係，是一種會隨著族群彼此勢力消長而不斷變動的「力的番界」：所謂番界，不過存在於平埔、漢人和高山族勢力的接觸點上，這種力的番界，當然會因勢力的消長而全面移動；因此雙方必須時時頃全力維護這一條漂浮在力之均衡點上的番界（施添福 1995：66-67）。換言之，若能考慮納入「淺海地帶」這一處地理空間，視為原漢人群接觸過程中一道更為動態的人群界線，或許能提供未來關於研究三貂社、金包里社與大雞籠社的社域變遷歷史和原漢族群互動記憶的不同視角。

五、結語

本文藉由記憶與口述史的視角，從馬賽族人後裔耆老的記憶重新審視族群互動樣態，希望以更具有主體性的敘事位置，反思長期以陸地開發及漢人為核心的開發史記憶之問題。聚焦於自 2020 至 2022 年間採訪的口述資料，尤其是在沿海地帶，過去為平埔族部落社域附近的傳統聚落，皆留存不少南島海洋文化如何被不同外來人群、環境因素轉化的歷史與記憶。試圖針對臺灣東北海岸地區僅存少

¹⁵參看（鄭螢憶 2021：51-103）。

數的漢人及平埔族原住民後裔的耆老進行訪談，發覺昔日原漢族群在沿岸和淺海地帶的水域界線的相關記述和傳說，藉著這些傳說和口述資料，探求在此地理空間鮮少被關注到的水域社會活動，並進而欲詮釋南島環境、族群歷史文化與海洋記憶之間的關係。

另一方面，基於田野調查、耆老訪談獲取的材料，雖然能夠補充文獻史料的縫隙，但仍有很大的不足。因為稀少的口述資料仍不足以清楚論證原住民與漢人之間在海洋領域的細微消長過程，諸多問題僅能據以有限資料來推測，並有待未來進一步深究。例如：各個時期政權力量介入的程度不同；漢人移民在土地取得的手段；漢人從海上而來後取得沿海陸地，原住民失去原有的海域，過程變化是如何等，未來有待解決的問題仍多。若海洋文化是南島文化及人群歷史的重要核心，那麼漢人社會與海洋人群接觸的過程，究竟留下哪些關於人群互動的海洋記憶，也是未來值得深入探尋的部分。

參考書目

不著撰人

1873《臺灣清國屬地》。東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

1880《全臺前後山圖》。華盛頓：美國國會圖書館藏。

王甫昌

2003《當代臺灣社會的族群想像》。臺北：群學。

伊能嘉矩

2011《臺灣文化誌》。臺北：臺灣書房。

宋錦秀

1996〈嘉慶以前三貂鹽寮地域史的建構〉。《臺灣史研究》3（1）：98-142。

原住民族電視臺

2012〈捍衛傳統凱達格蘭族要登釣島祭祖〉。「原住民族委員會網站」。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1qSv6AkjZo>，2022年10月12日上線。

杜披雲

2000《風雨海上人（上）》。基隆：基隆市政府文化局。

李復

1983《滄水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李壬癸

2001〈巴賽語的地位〉。《語言暨語言學》2（2）：155-171。

李壬癸

1997《臺灣平埔族的歷史與互動》。臺北：常民文化。

李仙得

2013《李仙得臺灣紀行》。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吳佳芸

2009《從Basay到金雞貂——臺灣原住民社群關係之性質與變遷》。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溫振華

1995〈臺北縣鄉土史的重建：以三貂社為例〉。《北縣文化季刊》43：35-48。

陳宗仁

2013〈十七世紀末〈馬尼拉手稿〉有關雞籠人與淡水人的描繪及其時代脈絡〉。《臺灣史研究》20（3）：1-42。

2012〈十七世紀前期北臺灣水域社會的商品及其交易型態〉。收錄於林玉茹主編，《比較視野下的臺灣商業傳統》頁 479-518。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陳世一

2005《雞籠灣傳奇》。基隆：基隆市政府文化局。

1998《八斗子耆老訪談錄》。基隆：財團法人海洋臺灣文教基金會。

康培德

2003〈十七世紀上半的馬賽人〉。《臺灣史研究》10（1）：1-32。

黃智慧

2000〈南北源流交匯處：沖繩與那國島人群起源神話傳說的比較研究〉。《民族學研究所集刊》89：207-235。

黃麗生

2019〈1626西班牙人佔領以前漢人移居基隆和平島歷史進程與性質〉。《海洋文化學刊》27：頁1-32。

黃美英

1996《凱達格蘭族文獻彙編》。臺北：臺北縣文化中心。

翁佳音

2008《荷蘭時代—臺灣史的連續性問題》。臺北：稻鄉。

1999〈近代初期北部台灣的商業交易與原住民〉。收錄於黃富三主編，《台灣商業傳統論文集》頁45-80。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簡宏逸

2020〈從蟒甲到社船：1650年代至1750年代臺灣北迴沿海航路的商業活動〉。《臺灣史研究》27（4）：1-34。

鄭瑩憶

2021〈北臺灣大雞籠社的生計模式與地方社會變遷（1620-1900）〉。《臺灣史研究》28（3）：51-103。

詹素娟

1998 〈Sanasai傳說圈的族群歷史圖像〉。收於劉益昌、潘英海主編，《平埔族群的區域研究論文集》頁29-59。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2001 〈地域社群的概念與檢驗--以金包里社為例〉。收於詹素娟主編，《曹永和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頁63-80。臺北：樂學。

劉益昌

1998 〈再談臺灣北、東部地區的族群分布〉，收於劉益昌、潘英海主編，《平埔族群的區域研究論文集》頁11-13。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廖秋娥

1996 《臺灣地名辭書（卷十七）基隆市》。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施添福

1995 〈區域地理的歷史研究途徑〉。收於黃應貴主編，《空間、力與社會》頁39-71。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唐羽

2004 《臺北縣誌》。臺北：臺北縣政府。

Tribal Traditional Domains and the Interaction of Memories of Indigenous-Han Chinese Relation in the Shallow Sea Areas of Northern Taiwan

Ting-yu Liang *

ABSTRACT

The Kitapali Tribe, Quimaurri Tribe, and Kivanowan Tribe of the Basai people in the northern coast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Amis and Kavalan tribes that historically resided on the eastern coast. In addition to common ancestral legends and trans-island migration narratives, these tribes engaged in trade and communication using the waters of eastern Taiwan as navigational channels. While existing research predominantly focuses on land deeds and documents arising from the Han Chinese land exploitation during Qing Dynasty to study tribal social changes and land rights, little attention has been given to the traditional fishing realms in the shallow sea areas off the northeast coast, specifically those of the Kitapali Tribe, Quimaurri Tribe, and Kivanowan Tribe. Based on my interviews, elderly individuals of both Han Chinese and Plains Indigenous descent in the northeast coastal region continue to recount memories of past inter-tribal interactions, often describing the coastal and shallow sea boundaries between communities and preserving numerous maritime legends. Built upon this foundation,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and interpre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ustronesian environment, ethnic history, culture, and maritime memories. By considering the “shallow sea area” as a geographical space,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understanding it as a dynamic boundary in the process of Han Chinese interactions with indigenous groups

* The Ph. D. Program Artistic Practice and Critical Research, Department of Fine Arts,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tyshells@yahoo.com.tw

could provide insight into the maritime memories and oral histories of coastal tribes as a traditional realm. Furthermore, the paper attempts to highlight the significance of incorporating the “shallow sea area” into discussions about contemporary indigenous issues such as “traditional territory” and historical transitional justice. This perspective offers a fresh approach to exploring the possibilities for discourse in the shallow sea areas of northern Taiwan concerning the indigenous communities’ historical interactions and maritime traditions.

Keywords: Basai, Austronesian Peoples, Indigenous-Han Relation, maritime memories